

振興經世致用的學風

吳相湘

——「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之評介

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

曹伯一博士著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

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臺北初版

基本定價拾圓

二十四開本 六九〇頁 附英文摘要

「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一書的出版，在我國學術研究風氣上及現代史研究的本身，可以說都具有不平凡的意義。

面對現實、經世致用，原是我國儒學最高目標。不幸秦皇漢武各以不同手法錮蔽讀書人的思想，隋唐科舉、明清八股，尤其清初文字獄，重重壓力，與時俱增，遂使讀書人完全逃避現實，「面壁十年」成爲習尚。顧亭林之號召，曾國藩等以身實踐，仍不能使經世致用學風復興於近代。戊戌維新之初，康有爲力言：國土之割讓，巨額賠款之交付，國勢之危如累卵，均「八股」毒害有以致之，光緒帝爲之動容。而廢八股改試時務策論之詔諭，竟爲使變政演成政變的一個導火線。讀書人耽於空談不肯面對現實之積習不易轉移，由是可見。

早在戊戌維新前四年，國父孫先生上李鴻章書即已指陳「不知之人多」「能行之人少」是「中國極大之病源」（見拙撰「國父孫逸仙先生」，傳記文學社印行）。辛亥革命甚至五四運動以後，即民國十年夏，國父對廣州教師學生演講，

猶復痛切指出這一逃避現實積習的謬誤：「十年來，政治教育家會無出一言立一說以教斯民，而於不談政治之謬說，乃獨倡之，民國有今日之現象，無足怪也。苟猶持斯言而不悟，再歷十年，民國亦不得有進步」（見拙撰「國父全集外二篇重要演講佚文」，東方雜誌本年二月號）。

不幸國父逝世，共黨即乘學術思想界的真空狀態而肆其宣傳組織工作，加以外患內亂交相激盪，更使國家危殆，長期抗戰雖獲勝利，和平建國却成幻夢，實在是極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沒有面對現實痛下知彼知己工夫所自召。蔣廷黻當時痛言：大學師生對關係我國的兩大隣國（日俄）從未做過研究認識工作，一遇事端發生，摭拾外國報紙雜誌的皮毛再加感情筆調就成爲「時論」，甚至是著名「政論家」！

以我國對日抗戰犧牲之巨大，而有關著述用「屈指可數」形容已嫌太多，事實上除開梁和鈞教授之「九一八事變史述」一書以外，具有學術水準之著作實絕無僅有。史官學人真無以對戰時死難的軍民！

這一貧乏現象，在學術出版界有關對蘇俄及共黨的專題研究上更表現得顯明，卅餘年赤禍之深痛，仍未能徹醒象牙塔中之雅士，尚復何言！

基於上述背景，「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一書問世，自然就具有不平凡意義，尤其是書出自一少壯學人之手，更是值得注意——著者曹伯一博士今年約四十許，上溯其渡海來臺之時不過二十許，而在是書完成之前，亦即十年前其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之碩士論文「中共政權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之研究」，也是面對現實所作「知彼」工夫。青年學人能够有此抱負、見識、毅力，實在可佩。相湘於此惟有自愧孤陋寡聞知人太少，誠懇希望有如曹博士一樣的青年壯年學人正在埋頭做知彼知己工夫，期待其著作早日問世。

我們常自認具有長期反共經驗，但如何將這寶貴經驗傳之於世，尤其是鼓勵年青一輩學人致力研究這些經驗，實在是當前急要（註一）。如果學術研究風氣能够從此轉變：注意面對現實以經世致用，則曹伯一博士此一著述應該是一重

要里程碑。

就中國現代史研究來說，共黨問題實為貫穿內外的重要關鍵，「江西蘇維埃」三年歲月，更為共黨承上啟下的不可缺少的環節。曹君選擇這一專題作深入研究，可說是把握要點。

學術研究最主要的憑藉是第一手原始資料，

「江西蘇維埃」崩潰以後，共黨即步上逃亡流竄長途，資料攜帶自不容易，而為國軍擄獲且運來臺灣者為數却甚多；故在今日研究此一專題，臺灣為主要資料收藏中心（註二），觀乎此書未北實為主要資料收藏中心（註二），觀乎此書未「參考書目」，即可見其憑藉之豐厚——「參考書目」分七大類：（一）一般非共書刊約五十餘種。（二）非共報刊約六種。（三）江西蘇維埃政權法規條例約二十七種。（四）共黨決議及指示約四十餘種。（五）共黨書籍約六十餘種。（六）共黨報刊約七種。（七）外文書籍約十餘種。在這七大類資料中，事實上有多少種為資料彙集，其中包含尤富。如按外國人著述編列引用書目，輒喜列舉篇名，而不祇用資料彙集一書名，則本書參考引用書目當更增多。著者不以此自炫，具見踏實作法。

在上述七大類資料中第（三）（四）（五）類，大多是當時原始資料，著者能充分運用，是形成此書內容充實的主要因素。事實上：本書還有一重要憑藉，是參考書目未提及而在篇首自序中指出的：「訪問江西旅臺人士及當年參與實際工作諸先進，以為印證」，這就是近年盛行的所謂「口述歷史」。這使得若干重要關節不見於紙面記載或

史闕有間」的更獲得「穿針引線」的重要提示或補充。更難得的是著者對江西蘇區有頗相近的直接印象：「民國三十四年間，筆者在黎川之鍾賢受入伍訓練，故於該地印象頗深，巨宅高第均成斷垣殘壁，充斥一片淒涼。時陸軍第二〇八師分駐樟村、橫村、鍾賢諸地，筆者隸六二團駐鍾賢」（頁五八〇註二五）。其所列舉地名均為蘇區。

有豐富資料的憑藉，更需要經緯分明不支不蔓的嚴謹組織，才可結構成一學術著作。就本書內容篇目來看，可說是達到認識問題駕馭資料把握重點的要求。全書分三編十章四十三節：第一章編江西蘇維埃之建立：第一章建立背景、第二章建立經過、第三章組織型態。第二編江西蘇維埃之鬪爭動員作為：第四章土地鬪爭、第五章軍事鬪爭、第六章財經措施、第七章肅反工作、第八章黨務活動與黨內鬭爭。第三編江西蘇維埃之崩潰：第九章崩潰經過、第十章崩潰原因。

結構層次顯明，敘述事實扼要，文字簡潔易讀是本書優點。同時更重要的是著者顧及到絕大多數讀者對這一問題的生疏，加以內外情勢的錯綜複雜，故每編開始即有一簡明提要，並多利用表解使讀者更易獲致深刻印象。例如第一編第一章「外患內亂給予中共壯大機會」表解，將國際事件、國內紛擾、共軍活動分別繫以年月，讀者可一目瞭然。同樣第三章組織型態之「三次政綱內容比較」、「第一、第二兩次全蘇大會憲法比較」均出之以表解，著者自需耗費較多時力，但對讀者却呈獻一簡要深刻的印象。

如上所陳：江西蘇維埃一段落在中共四十餘

本書著者在敷陳事實時，不僅注意其靜態即其憲法法律規章條文，更著重其動態，即這些紙面文章所表現的事實。著者曾一再指陳：「關於政綱、憲法、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各節中，大體已鈞劃出江西蘇維埃政權組織型態的輪廓，但江西政權的組織實質，必從其運用中，如選舉制度等作全面觀察，乃能窺其全豹」（頁一五九）。「從法規條文中，顯示不出當時地方蘇維埃的實際工作情形，實際上地方蘇維埃的工作重點是偏重於鬭爭工作、人力動員、物力動員少數項目，興國與石城是當時蘇區內地方蘇維埃的模範，這兩地區的工作情形，可引作說明」（頁一五二）。著者之所以能作「全面觀察」「說明」，主要是充分運用當時瑞金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等報刊，這都是第一手原始資料。惟其如此，著者更引用「紅色中華」所透露當時——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與一九三四年二三月中央政府機關經費預算與實支數目，「乃目前所僅見者」，「可概見當年江西中共政權財政支出狀況」（頁一三五——七）；就更顯得非常難得可貴。至於著者引用「紅色中華」「二蘇大會特刊」，描述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二蘇大會林伯渠作經濟報告時，忽得前線軍報，乃由毛澤東提出「緊急報告」，全場震驚，大會閉幕日期因此提前，更顯得生動。而著者比較引用「紅色中華」刊載毛澤東言詞以及其後在延安說詞，指出其前後矛盾誣過他人的嘴臉，更使讀者明瞭其欺世盜名的真相。

年發展中有承上啓下功用，著者曾致力於今日偽政權研究，故能貫穿其間。例如第三章第五節「選舉制度」結語：「中共的這一巧妙經驗，全部為一九五四年的中共憲法及選舉法所吸收」（頁一七〇），至於其選舉法規定「以十六歲作為限齡，殊屬少見……驅策紅衛兵之基本構想亦即在此，在江西時期已經有此經驗」（頁一六七）。

值得注意的是對國軍第一次至第五次圍剿，以及共軍之反圍剿的得失均作坦實記述。其中引用中華軍委編「革命與戰爭」所刊共產國際派遺來江西之外籍軍事顧問華夫（李德）論文多篇，尤為難得資料。對於雙方若干重要戰略戰術原則之倡議由來及其創意人均不厭求詳溯其初源，其中甚多得自當時關係人口述。例如「在第五次圍剿獲勝因素中，堡壘戰術發揮了無比威力，其成就乃為舉世所矚目……碉堡戰術的實質不僅是軍事的，碉堡戰術糅合了軍事經濟與政治各種作用於一體，這是從經驗中得來的教訓」。「關於碉

堡戰術原則之創議及設計，邱清泉將軍厥功甚偉。當時邱將軍任南昌行營政訓處宣傳科長，碉堡戰術構想之提出與具體辦法之草擬，多出邱將軍之手。當時邱將軍任南昌行營政訓處長。同時，對於中共反圍剿的措施也是運用現居臺灣的當時關係人物的口述歷史。是這樣地兩面照應自然構成的圖畫就比較完整。

至於國軍當時採取的經濟封鎖政策是加速江西蘇維埃崩潰的主要因素。本書著者引用國軍及共產文字以外，更引用外國作家如魏德森博士

(Dr. Whitson) 的著述，更顯現旁觀者清的公評論點（頁六一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由國家對共黨地區採行「禁運」措施，自應與此經驗有關。

(註一) 今日臺灣省知識青年對於認識敵人風，則更是促進自立自強的急務。

除開大處著眼以外，小處著手的工夫也隨處可見。例如「中央準備委員會」出席人數，著者根據是會編印的「中國蘇維埃」第一集之附錄，記述開幕時出席各地代表僅達原定人數（四十五人）之三分之二約三十人而已。原註指明根據資料，並說明蕭作梁教授著書第四三頁亦然其說，惟美國盧斯（Robert C. North）書第一四九頁稱出席七十五代表。著者特說明「似另有所本」（頁九五）。又如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決通過議案六項。但日本「波多野之中國共產黨史」，所新資料發現時再行補正」。可見著者謹小慎微多聞闕疑的嚴正態度。

(註二)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相湘應邀參加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之「蘇聯與亞洲人關係之討論會」時曾報告臺北收藏中共資料之內容。其後美籍日本歐洲學人即絡繹來臺閱讀研究。資料中心人員對我國學人前往研究者之「寥若晨星」殊感訝異。而若干大學研究生每與相湘談及題材輒以此種資料外，臺北現藏其他有關中國近代史原始資料尤多，何以不加利用而輒喜拾他人牙慧？相湘是致面對某一來訪者指出其所作「釐金」論文竟不參考德宗寶錄而抄襲他人引用光緒東華續錄之非。青年學生如此取巧敷衍，實在令人浩歎。今報載教育部計劃在兩年內增設各大學研究所，其中有「使各研究所能兼負培養國內大專院校師資的任務」。自為當務之急。但如祇求量之發展，而不作質的整頓，尤其取巧敷衍不能消除除，對我國今後學術研究風氣與實質均將貽害無窮。

忘，來者可追，讀此書者實在應該反求諸己努力自立自強。鼓勵青年面對現實，振興經世致用學風，則更是促進自立自強的急務。

(註二) 今日臺灣省知識青年對於認識敵人的經驗，實在非常缺乏。相湘親見一青年學人數年前應聘往東南亞某大學任教時，不做知彼工夫，即輕易與學生無所不談，對方認為可資利用，該大學予以開除。香港工商日報（去年三月十五日）及南洋商報等均刊載其事。可謂殷鑑不遠。

(註三)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相湘應邀參加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之「蘇聯與亞洲人關係之討論會」時曾報告臺北收藏中共資料之內容。其後美籍日本歐洲學人即絡繹來臺閱讀研究。資料中心人員對我國學人前往研究者之「寥若晨星」殊感訝異。而若干大學研究生每與相湘談及題材輒以此種資料外，臺北現藏其他有關中國近代史原始資料尤多，何以不加利用而輒喜拾他人牙慧？相湘是致面對某一來訪者指出其所作「釐金」論文竟不參考德宗寶錄而抄襲他人引用光緒東華續錄之非。青年學生如此取巧敷衍，實在令人浩歎。今報載教育部計劃在兩年內增設各大學研究所，其中有「使各研究所能兼負培養國內大專院校師資的任務」。自為當務之急。但如祇求量之發展，而不作質的整頓，尤其取巧敷衍不能消除除，對我國今後學術研究風氣與實質均將貽害無窮。